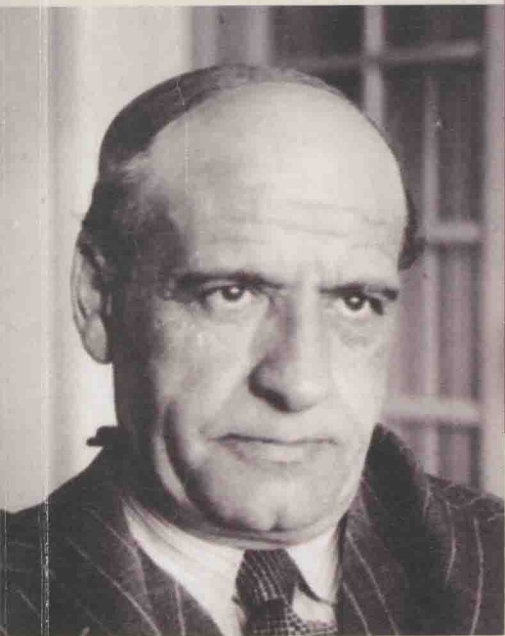


España Invertebrada



没有 主心骨的 西班牙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 著
赵德明 译

José Ortega y

Gasset

没有 主心骨的 西班牙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 著
赵德明 译

España Invertebrada

José Ortega y

Gasset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 / (西) 加塞特著; 赵德明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407-7518-6

I. ①没… II. ①加… ②赵… III. ①政治哲学—西方国家—现代 IV. ①D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8278 号



策划编辑: 陆 源

责任编辑: 陆 源

封面设计: 居 居

出版人: 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55087201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数: 180 千字 印张: 8.25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534-2671208)

目录

CONTENTS

	导 论	弗朗西斯科·何塞·马丁
3	一、奥尔特加·伊·加塞特之星与王朝复辟的衰落：为不稳定时代和混乱时期画像的草图	
19	二、从“西班牙问题”到“欧洲问题”：认知语境和思想史	
34	三、《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	
61	本版说明	
67	第二版序言	
80	第四版序言	
	第一部分 地方本位主义和直接行动	
92	1. 加入与解体	
100	2. 加入国家的威力	
109	3. 为什么分离主义如此之多？	
112	4. 如此重要	
119	5. 地方本位主义、利己主义	

132	6. 分享垄断
138	7. 军事集团问题
144	8. 直接行动
149	9. 军人造反

第二部分 缺乏最优秀的人

159	1. 没有男子汉吗？或者说，没有群众吗？
171	2. 群众帝国
177	3 “Kitra” 时代和 “Kali” 时代
183	4. “应该如此” 的魔术
188	5. 示范性和顺从性
196	6. 缺乏 “最优秀的人”
220	7. 选拔的原则

229	附 录
232	书 目
239	大事年表

导 论

弗朗西斯科·何塞·马丁

一、奥尔特加·伊·加塞特之星与王朝复辟的衰落：为不稳定时代和混乱时期画像的草图

1914年的大选暴露了卡萨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约设计的政治体制危机，他的目的是要让王朝复辟（1875—1923）下的西班牙维持政权稳定。在此前的岁月里，就不断有危机的信号传来。但是，那个政权总是（或者几乎总是）可以控制局势，尽管使用了差不多相当冒险的临时侥幸办法，而随后却显露出政治和社会生活之间日益发展的不协调性，好像政治永远落后于社会问题，社会现实问题经常超越政治，政治没有能力走在现实前面，也没有能力理解社会问题的根源。是的，不乏批评的声音，但是，政府总是愚蠢地顽固坚持充耳不闻的对策（不理睬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和派的声音），或者狡猾地使用自己那套政治说辞（什么复兴运动主张、联邦主义），把对手不加区别地统统打入死牢。那次大选的结果超过了令人注意的程度以及政府的必胜信念，但是巩固了这个政权已经无

法修复的看法（打破了轮流坐庄的逻辑，保守党分裂，自由党内思潮涌动，民族主义和工人组织有所发展）；因此，在政府决策层流传着一种失望和受挫的情绪，因为没能弥合前一年由于毛乌拉派分裂造成的裂痕——这个创伤后来没有给保守党造成致命伤，但是却毁灭了王朝复辟体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以及西班牙在摩洛哥重新发动的殖民战争——加剧了体制危机。西班牙在世界大战中采取的中立态度，带来了贸易平衡上的有利增长；因此，在开战的头几年，减轻了社会对政府和政界的压力。但是，由于利益分配不均以及物价上涨导致一系列恶果的发生，到了1917年危机发生时，演变成最高峰。这一切完全证明了这个政权没有能力对付重大事件的发生。1917年夏天，三股强大的抗议潮流汇合，让政府、君主政体以及这个体制本身置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军官们通过成立国防军事洪达（委员会）举行军人抗议活动，议员们（主张地域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左派）在巴塞罗那开会发动抗议活动，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以及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号召举行8月总罢工。除去政府还有自卫能力之外，政府一时没有垮台的原因还有，上述三股抗议力量无法和解：军人们借口自己是祖国的拯救者，看不起工会和民族主义者（以康博为首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议员，号召举行全国议员大会）；而议员又拒绝走工会罢工的革命道路，他们虽然不相信造反的军人，却企图争取军人的支持，以便恢复他们的政治权利；而工人运动组织则怀疑这些改良派的议员不会真心实意地帮助工人争取合法权利；工人组织也想争

取军人的支持，但是顾虑重重，因为毕竟信念不同。总罢工的危险（俄国革命道路的影子鼓舞着准备罢工的劳动者）造成了议员们的组织分化、瓦解，最后他们还是加入了捍卫体制和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行列里。军人是镇压总罢工和恢复社会秩序的负责人，当社会秩序混乱无序时，就会同意大兵们恫吓的身影重返政治舞台：对19世纪军人造反的记忆再次让人们想起，这可能变成一种越来越逼近的威胁，而不久之后，即1923年9月，普利莫·德·里维拉把这一威胁变成了现实。

1917年秋天，西班牙是一副形象颠倒、表情错乱的样子：军人们的和解态度令人感到惴惴不安、摸不着头脑。政府无力制止军人洪达运动的发展，导致加西亚·布里托下台；与此同时，1918年2月“真诚选举”发出了明白无误的信号：社会主义者、极右势力以及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民族主义者在迅速发展——代价是各个政党轮流坐庄。组阁困难立刻显现出来了。似乎一切又都摇晃起来了，好像派性的恐惧和狭隘目光牢牢钳住了政界的手脚。形势严峻，甚至国王都威胁着要退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安东尼奥·毛乌拉的领袖气质得以组成民族团结政府。这一届政府维持了七个半月；政府内部的紧张状态（阿尔瓦与康博之间的矛盾，毛乌拉与塔托之间的矛盾）结束了他们的执政并且打消了在体制内进行改革的希望。继毛乌拉政府之后，走马灯似的一届又一届政府上台和下台，都因为软弱无能，尤其是没有办法解决上一届政府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而一一被否定；这些问题是：社会问题、民族主义问

题、殖民战争。

资本家和劳工日益加剧的冲突，在“一战”刚刚结束的欧洲司空见惯，在西班牙工业区以及南方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的农村，表现出致命、紧张的特点。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工会力量迅猛发展（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1915年有一万五千人；1918年增加到七万人），战后发生的经济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企业主协会的强硬态度，形成了日益发展的对抗性两极矛盾。1919年在巴塞罗那加拿大园区的罢工、冲突双方的谈判、不履行谈判协定、后来对罢工的镇压，都可能用来解释后来一些从根本上有害的做法以及1917—1923年间社会冲突激化的“正常性”。

圣地亚哥·阿尔瓦与弗朗塞斯科·康博之间的紧张关系，清楚地表明了那个时期民族主义争论的程度和范围。这不仅仅是在理解西班牙民族的方式上存在两种思想概念之争（政治统一中央论与多元联邦论的对立），而且还是两个有着利益冲突的社会之争（农业社会反对工业社会，农村社会秩序反对城市资产阶级秩序，反之亦然）。通常，马德里中央政府总是用极端怀疑和警惕的眼神注视着加泰罗尼亚人要求恢复自身权利的斗争，认为加泰罗尼亚人是破坏西班牙团结的敌人，加泰罗尼亚人的斗争是分裂的前奏；加泰罗尼亚人虽然出于功利的目的加入了那几年的中央政府，马德里却总是设置重重障碍，不让加泰罗尼亚地区联盟在国家现代化中以及民族政策更新中真正发挥有效作用（也许1922年西班牙国王请康博出任政府首相是对的）。在加泰罗尼亚，自从1914年成立了共同体以来，地区联盟就是

两头受气：一头是热情的左派，他们为争取更大的自治空间而奋斗；一头是忧心忡忡的右派，他们发现革命的危险就要临头了。为了与地区联盟一争高下，有些人要证明地区联盟过于温和、缺乏政治勇气，另外一些人则证明该联盟过于冒险、自治的要求太过分，于是加泰罗尼亚行动组织和拥护君主政体同盟同时问世了；行动组织毫不隐晦地宣告独立的主张以及实行共和制的要求；君主政体同盟则是与加泰罗尼亚人唱对台戏：主张西班牙实行中央集权下的民族主义组织形式。至于巴斯克民族主义问题，由于影响和发展程度不如那时的加泰罗尼亚，也许是由于巴斯克进入工业社会和资产阶级上层的能力欠佳（应该记住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出现是最坚决反对政治、经济改革的阶层支持之结果：他们是保王派和支持王室特权的人们），保王派的恢复元气得益于两个因素的交织：圣地亚哥·阿尔瓦的计划意味着一种危险——捞不到世界大战带来的意外之财；1917年三省议员代表大会的召开意味着要求地方自治。如同在加泰罗尼亚一样，主张西班牙实行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成立了君主政体同盟，以便在1918年的大选中确立自己的地位。

殖民地问题起初是一块跳板：因1898年美西战争失败而感到屈辱的西班牙准备重新去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和尊敬；但是，最后竟然成了“炸弹”——加速了复辟王朝的灭亡。西班牙在摩洛哥这个保护国里出现不是什么强行租借或者什么特权许可，而仅仅是法国和英国之间寻求国与国之间平衡的结果。摩洛哥战役的高额开支（不仅是经济方

面，也有政治方面：1909 年还动员了后备役士兵，结果爆发了“悲惨的一周”），很快暴露出这是对几届政府的沉重负担，但是，没有人有能力对放弃一场梦想承担责任（社会上有人对此发声抗议）。1921 年摩洛哥发生了安瓦勒惨败：阿卜杜勒·克里姆的部队给西班牙军造成重创。马德里政府追查责任。政客和军人互相指责。政府一届比一届软弱无能；上台、下台的换届速度令人头晕目眩；国王不再掩饰对政客们的厌烦，他与军人们密谋策划，公开谈论救国救民的唯一办法就是实行临时独裁统治。1923 年 9 月，就在皮卡索将军准备在国会宣读关于安瓦勒惨败的责任报告书之前的几天，加泰罗尼亚总司令普利莫·德·里维拉发动了与国王同谋的不流血政变，宣布实行独裁统治，终止公民权利，全国进入戒严状态，解散国会。

独裁统治并非不可避免；但是，助长独裁的人很多，有的上下串联，有的玩阴谋诡计，有的漠然置之，有的表示无可奈何。与其说里维拉将军结束了一种与时代脱节的陈腐政治，不如说他消灭了本来可能诞生（或者正在诞生）的东西，那么这是当代史学家去解释的事情了。实际情况是，里维拉上台时没有什么人反对，有些声音也是在预料之中的，而得到的拥护可是来自社会广泛阶层的，没有人觉得自己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宪法规定的秩序。知识分子们，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各个方面都是活跃的，这一次却普遍三缄其口，显得格外冷漠。知识分子早就讨厌王朝复辟时期的政治了，那以党派利益和个人恩怨的假装游戏，早就打消了他们的干劲和革命精神，他们不相信现有

的一切，不相信可能发生的事情，哪怕有一点变革的迹象，在墨守成规、僵化没有出路的形势下引入一点点活力的迹象。他们需要摆脱一种难以承受之重，而不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接受独裁统治；他们厌倦了旧秩序，但不急于肯定新秩序；他们把自己的力气消耗在对付惰性的大墙上，而不愿意与自由、民主的思想原则决裂。1923年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创办《西方杂志》时，提出“既然政治从来不打算弄明白事情真相，那就不问政治吧！”这个“意图”或许只能用别的方式加以理解了。

1919年奥尔特加在一篇值得回忆的文章里，严厉谴责过用独裁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文章中出现了普利莫·德·里维拉的危险形象，他说：“我们是独裁者的敌人，无论他来自上层还是下层。他们都同样可恨，因为一切独裁统治都滋生民族灾难。”^①在他信奉自由主义思想的灵魂深处，最为反感的就是独裁统治。因此，他一看到有独裁迹象的出现时，就不免感到灰心丧气。他说：“非常有可能——远远超出民主抽象派猜测的可能性——的是：不仅是在西班牙，同样在法国、德国、意大利，随时会出现要求建立独裁统治的呼声。这种可能性的初露端倪，或许是欧洲现在开始的这个时代最有意义的特点。”^②迷失在那个时代的漩涡里是很容易的。在“新时期”，奥尔特加知道“一战”结束^③，“新时代”就开始了，困难之处在于找到正确道路。“经历了独裁统治时期，我认为对当前的社会问题，独裁是一次有教育意义的经验。”^④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表明，独裁既不值得赞美，也没有教育意义，因为这事就

连奥尔特加也无法说清楚，甚至现在的人也无从判断（因为首先要做的不是理性判断，而是应该试图好好理解、弄明白原委）：奥尔特加是在王朝复辟时期的变化中，从对他的个人影响角度写起的。

奥尔特加的个人历史是在思想界领袖地位的苛刻要求下书写的。处在领袖地位，有赞扬，有冒犯，有敬仰，有咒骂，他一定不止一次感受到了孤独和恐惧，因为要承担一种也许是过分的责任吧。在他实际上还没有能力做“导师”之前，周围的环境就迫使他当上了“领袖”。那时他是个英俊小伙，出身门第好，在那时的西班牙人看来，他受到精心栽培：在国外留学，前途远大。早早地当上了教授，很快便功成名就了。经常出入社交场合，健谈，喜欢成为聚会的中心人物。他愿意当个举止大方、谈吐文雅的人，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是：思想的亮度是从皮鞋的锃亮开始的。他喜欢讽刺人，善于挖苦人。

1914年，全国大选后过了十五天，奥尔特加在马德里剧场做了题为“新旧政治”的讲座。场内座无虚席。人们有兴趣，有好奇心，也热情，空气里不乏异议的声音。会上有自由-改良派青年，有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有继承复兴运动和克劳泽主义遗产的人们，也有嘻嘻哈哈放荡不羁的艺术青年，还有一大群来自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名媛淑女，她们是奥尔特加之星无条件、持之以恒的追随者。那次活动有某种开创意义，尽管不是奥尔特加的第一次讲座，也并非他首次公开演说；场上那些照片表明他特别紧张，他知道下这样的决心是没有退路的，因此其分量好像压得他

喘不过气来。那时，西班牙政治教育联盟正式提出要发动一场精英分子运动，通过这个运动那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企图采取行动，直接介入王朝复辟政治。奥尔特加向该联盟做了自我介绍，自荐为一次具体的政治行动当领导和担保人。这等于是自己跳进了火坑，孤注一掷。与奥尔特加一道签署开会通告的多数人是他的同龄人（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费德里科·德·奥尼斯、阿梅里科·卡斯特罗、曼努埃尔·加西亚·莫伦特、何塞·莫雷诺·威亚、拉蒙·佩雷斯·德·阿亚拉、费尔南多·德·罗斯·里奥斯等人），当然不乏前辈代表（安东尼奥·马查多、拉米罗·马埃兹图）以及后辈代表（佩德罗·萨利纳斯）。他们不打算结党，而是在政党舞台分化之前做点事情，能给国家献上一种纯粹的政治文化，能够重新恢复民主活动的尊严。奥尔特加演讲的要点是：狠批王朝复辟体制以及轮流坐庄的制度，反对陈规陋习和既定的惯例，提倡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针对君主制和摩洛哥问题提出一种合乎情理的现实态度。奥尔特加本来可以谈谈实用主义政治缺乏一贯性的问题，而不是政治教育联盟的失败：对于奥尔特加的演讲，新闻界采取了谨慎跟进的态度，文学协会的圈内有点反响，聚会的小天地里也有议论，但是他没能打破那个时候的政治空气。面对知识分子的挑战，政府置若罔闻。

当年7月，奥尔特加出版了《堂吉珂德的思考》，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这时，他已经是一位有名气的作家了（早在1902年他就经常为那时的报纸撰稿了，主要是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这是加塞特家族开办的日报，有着很

高的声望)；但是《堂吉珂德的思想》的问世为他日后的人生历程奠定了一个新基础，提供了新范围：这部著作支持他超越现状、走得更远的决心，让他摆脱眼前已经取得的舒适地位，去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日益上涨的身价。也是在这个7月，他与政治教育联盟的几位盟员，加上出版家鲁伊兹·卡斯蒂约，一道商议创办《西班牙》周刊的计划。1915年1月底创刊号问世。《西班牙》汇集了政治教育联盟改革的呼声以及这样模糊不清的信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会给欧洲带来新面貌，为此需要紧急行动起来，为迎接新西班牙的到来而积极工作^⑤。在由世界大战设计的欧洲新环境里，奥尔特加的想法是“重振西班牙的希望”^⑥。杂志的经济困难、奥尔特加与年轻的阿拉基思坦因之间的摩擦、奥尔特加辩论西班牙在欧战中采取中立态度问题上^⑦的不快立场，让他不得不辞去总编的职务（1915年11月）以及后来完全退出了编辑部（1916年1月）。但是，奥尔特加的反应出乎人们的意料：1916年5月《观察者》创刊号问世，这是他一人独资经营的杂志，是“给亲蜜读者阅读的隐私作品”^⑧，字里行间第一次流露出倦意和失望的情绪，他不仅厌倦了“旧政治”——曾经坚决反对的东西——而且讨厌政治本身，他说：“政治这个王国，也就是谎言的国度。……是的，我感到憋气，因为物以类聚，真诚的人需要呼吸真诚的空气。我周围都是政客，他们对世界的本来面貌没有兴趣，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做事就要捞好处。”^⑨在创刊号上，他刊登了一篇批判巴罗哈的长文，还有一篇哲学文章，属于现象学范畴，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德国哲